

中国社会变迁： 反观与前瞻

朱国宏 林尚立 张 军 等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目 录

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农村的人口与社会变迁	
——侧重于江苏峭歧镇的初探性研究·····	朱国宏(员)
现代化与文化认同 中国的逻辑 ·····	林尚立(猿)
合作博弈与中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失败	
——对近年来研究文献的综述与分析·····	张 军(缘)
中国经济制度选择的道德基础·····	高国希(怨)
“理性化”之不可逾越	
——从近代社会发轫谈起·····	肖 巍(员猿)
寻求秩序与意义 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自由主义	
·····	章 清(员缘)
清代一个徽州村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	
——以《重订潭滨杂志》为中心·····	王振忠(圆)
“天人合一”学说的意义及其当代命运·····	汪涌豪(圆)

朱 国 宏

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农村的人口与社会变迁^{*}

——侧重于江苏峭歧镇的初探性研究

一、研究选题及研究的缘起

本文以‘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农村的人口与社会变迁’为题,目的在于通过对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研究来探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迁(杂糅错乱)过程及其成因。其中,‘近代以来’特指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近现代时期,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贼寇肆虐)一般指江苏镇江以东、通扬运河以南、浙江杭州湾以北地区。这一地区历来是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代表,并受到近代以来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如陈翰笙 1924 年在江苏无锡县的调查研究,乔启明、汤普森和陈彩章(忧国忧民)1934 年在江苏江阴峭歧镇的调查研究,费孝通 1936 年在江苏吴江开弦

^{*} 本课题研究得到霍英东教育基金的资助,特此致谢。

弓村(江村)的社会人类学研究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已成为一个专门术语,一个特定研究对象的指称。即使是 1949 年代以来,也仍有不少学者把这一地区作为考察对象来开展课题研究,如刘翠溶(1913—1984)、费孝通(1910—2005)、黄宗智(1930—)、曹幸穗(1935—)等。本文也以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简称长江三角洲)作为研究对象,并以乔启明等人所选定的江苏江阴峭歧镇作为其代表,这样做的主要原因,一是试图通过对特定社区的研究来考察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迁问题,而 1949 年的调查资料提供了部分对比研究的基础^①;二是,江苏江阴峭歧镇在许多方面具有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代表性,它位于无锡北面,处于南京上海之间,离长江不远,在地理环境、气候、降雨、农副业、乡村工业等方面颇具代表性,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典型地方”(1949 年)^②。

本文如此选题,直接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作为 20 世纪 40 年代几次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之一,乔启明(1904—1984)等人进行的江苏江阴峭歧镇调查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而在全面分析

① 乔启明、汤普逊和陈彩章关于峭歧的研究报告最初是以《中国生命统计登记的一项研究》(1949 年)为题,1950 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牛津出版,1951 年在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移译时易名为《近代中国人口统计的一项实验》(1951 年)。该研究由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和美国迈阿密大学斯克里普斯人口问题研究基金会(1949—1951)合作进行,所形成的研究报告包括两个附录,其中之一是由汤普逊撰写的研究报告“对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展望”。以下引文页码均为中译本页码。

② 乔启明等,1949 年第 4 页。

工农业发展状况之后,汤普逊却得出了悲观的结论:“在考虑了所有这些经济因素,并且对分量较轻的社会因素予以一定的估计,我不得不对可见的将来中国生活水平改善的可能性感到悲观”(汤普逊,1929,第100页)^①。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分析得出悲观的结论并不令人惊讶。事实上,当时大多数社会调查研究(包括李景汉的定县社会调查、卜凯(John H. Kelley)的农户调查等)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不仅如此,直到20年代末,珀金斯(Pearson, 1929)在研究1927—192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时也还是对中国发展的前景不抱多大希望。他说:“人口的增长率从1927年以前数十年中每年不到百分之一一跃而为1928年以后的百分之二以上。……只要人口继续以每年百分之二或者更高的速度向上增长,那么,即使如此迅速地扩大现代资本的投入,也难以做到满足中国的需求。”(珀金斯,1929,第100页)^②。事实是,中国的发展始终处于庞大的人口压力之下,1928年的总人口几乎是1927年的三倍,但中国的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在近10年里。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在庞大的人口压力之下,中国的发展为什么能够成功?其社会变迁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如何解释这一过程?诸如此类的问题无疑是引人注目的,也是十分值得探讨的。

其二是，中国近四年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视为一种奇迹，并引发了经济学者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诸多解释性理论（如悦霖社、张军等）。林毅夫等，张军，林毅夫。

① 乔启明等, 1985, 第 104 页。

② 珀金斯, 第 10 页。

之下,与此同时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迁却缺乏相应的系统深入研究,在一些研究中,中国的社会变迁被归为‘变态的原型’而加以轻描淡写(霍夫亨滋和柯德尔(戈德森)讥讽道:“这是中国研究者的传统”。应当说,对深刻变化了的中国社会进行研究,其意义丝毫不亚于对迅速的经济发展的研究,但是,由于学术界更多地关心‘现时式’的社会问题研究,这种‘历时式’的社会变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正因为如此,近年有学者开始呼吁对中国社会变迁问题进行研究,因为,“中国的改革已经为重新思考社会变迁理论提供了极丰富的经验材料”(甘阳,1988)。

此外,如此选题还有方法论上的考虑,那就是,以往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大多属于宏观研究,对微观社会研究不予重视,这也使其研究陷入“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注重微观研究,在 1980 年代以来的经济史学界已开始得到重视,并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如黄宗智,1985;费正清,1986)。一项由德国大众基金会资助的关于乡镇企业的系列微观研究,最近也受到了关注(陈吉元、何梦笔等,1989)。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同样应当加强微观的研究,才能使我们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将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作为本文的研究课题,而研究方法上则侧重于微观研究。选择长江三角洲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到,一则它代表了中国的先进地区,其经验之于中国其他地区有着代表性意义和一定的示范性;二则这一地区历来为社会学家所关注并研究,已成为一个特定概念,在本文中,还具有对比研究的基础。至于将‘人口’和‘社会变迁’并列作为

关键词,主要是考虑到人口压力之于中国的特殊意义,正如费正清(费正清)所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要联系人口问题去认识,人口问题是形成一般概念的必要前提之一。”(费正清,1959)

本文将侧重于探讨中国农村(长江三角洲)近代以来人口与社会变迁的过程及其原因,目的在于解决理论上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认识和解释中国近现代的人口与社会变迁及其成因。在这一领域,中国社会史学科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也较少。一般的通史类研究,大多限于近代以前或 1911 年以前(如周谷城,1959)。尚无一部著作专门论述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问题。相关的研究,一方面见于相关的学科领域,如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张琢,1990;许纪霖等,1995)、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胡鞍钢,1995 等,另一方面见于时期性或时点性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形态研究(如陈吉元等,1995;曹锦清等,1995;江流等,1995;周晓虹,1995)。这些研究并非专为中国社会史研究而设,而且大多属于宏观研究的范围,其研究取向也多为‘现时式’的和对策性的。而国外对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史问题的研究,见于三个方面:一是通史类研究,晚近的著作一般包括了近现代部分,如谢和耐(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1989)一直叙述到 1949 年代;二是断代史类研究,大多数集中在近代,如杜赞奇(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 年的华北农村》(1990);三是相关研究领域,成果最为丰硕的当推中国经济史研究,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社会发展》(1990)。通史类一般是宏观研究,而断代史类和相关领域研究则既

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杜赞奇和黄宗智的研究均属于微观研究,并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和本课题研究不同的是,杜赞奇的研究更关心的不是社会变迁而是文化、权利与国家的关系,而黄宗智的研究虽然涉及社会变迁问题,但侧重点在经济变化上,特别是经济史上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业生产率问题、农业过密化问题等。

要了解和理解近代学者对中国现代发展的悲观结论为什么不能成立,进而了解和理解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迁史,套用现有的理论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惟一的途径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探讨其社会变迁的规律^①。而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社会变迁问题,从研究上说,加强微观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仅限于宏观或定量的分析,难免会套用现有的理论和信念,而微观层面的信息,特别是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有可能使我们得出不同于既有的规范认识的结论。而研究方法上则应遵循从史实到理论再到史实的原则。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我们试图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个具体的代表性社区的深入研究来考察和分析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迁历程。

① 柯文(马思聪译)认为,中国研究应当打破近代以来流行的“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模式,应当从“欧洲中心观”转变到“中国中心观”上来,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柯文,吴晓真译,何梦笔译,《美国汉学社》,1983年);柯文(马思聪译)认为,对中国进行分析,需要一种中间理论,它介于中国人现实的生活经历(“生活世界”)与一般经济与社会学理论之间。这种中间理论被他归为“社会型”(柯文,吴晓真译,何梦笔译,《美国汉学社》,1983年);王国斌(何梦笔译)则认为,应从中西比较史学的角度研究和理解中国,他说:“要超越欧洲中心论,首先应当回到欧洲。应当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发生情况,作为历史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式,认真进行讨论。”(王国斌,吴晓真译)

应当指出的是,本文只是这项课题研究的一部分,或者说这项课题研究的开篇。因此,本文并不企图解答其中的所有问题,而更多的是提出问题,并以此就正于大家同人。

二、江苏峭歧镇的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

峭歧镇为与江阴市腹地,东接云顾路,西邻锡澄公路,北枕花山。目前全镇总面积 19.85 平方公里。1982 年底总户数 1520 户,总人口 10200 人。辖有 10 个村庄。可耕地面积 1400 亩,山地面积 150 亩。应当指出的是,1982 年代的峭歧和今天的峭歧在地理范围上是有所区别的。主要是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建国后曾将峭歧的几个村划给相邻的青阳乡,1982 年又将临近的几个村庄划给峭歧。只是,就统计而言,可比的地理范围还是能够鉴别的。以 1950 年代为例,1950 年的几个基本人口数据和 1982 年的调查数据可对比如表 1 所示。

表 1 峭歧人口(1950—1982)

年份	户数	总人口	男	女	性别比	每户人口数
1950	1520	10200	5200	5000	104	6.7
1982	1520	10200	5200	5000	104	6.7

资料来源 顾纪瑞,“江阴县峭歧乡人口的近况”,载乔启明等著《近代中国人口统计的一项实验》,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2 年,第 15 页。

表 1 中可见,峭歧总人口增加 1000 人,平均每年递增 100 人。但是,表 1 中的 1982 年峭歧范围小于 1950 年的峭歧,因为,它不包括划到青阳乡的 10 个村庄。如果加

上这 远个村庄,则应加上 缘户、圆余人。这样,总人口将是 源余人,比 年增加 缘,平均每年递增 缘。

在可比的统计口径上说,峭歧在经过了 年之后,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年的总人口是 年的 圆倍。其中,性别比几乎没有变化,而家庭规模则明显缩小了。

由于人口的增长,峭歧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密度由 年的 远人 平方公里增加到 年的 缘人 平方公里;人均耕地面积由 年的 亩减少到 年的 亩,每平方公里所要养活的人口数由 年的 人增加到 年的 人。

这种变化还表现在峭歧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年的峭歧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而到 年已成为一个以农村工业为主的小城镇,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是 缘、怨和 圆;年时 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高达 缘,而到 年已减少到 缘(苏南地区平均数);年的集镇人口中仅占 苑,而 年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圆(江阴市平均数)^①;……年峭歧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状况参见表 圆资料。

应当指出的是,峭歧 年代以来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和整个中国的发展过程一样,峭歧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而言之,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即 年— 年间为第一阶段, 年— 年间为第二阶段, 年— 年间为第三阶

① 峭歧的资料引自《江阴年鉴(缘)》,苏南地区和江阴市的资料则引自陈惠仁等著《苏南人口现代化问题》(缘一书。

段。从经济上说,第一阶段为缓慢间以衰退的阶段,第二阶段为快速间以波动的阶段,第三阶段为持续高速发展阶段;从社会上说,第一阶段为传统社会阶段,第二阶段为以制度变迁为特征的社会变迁阶段,第三阶段为以社会全面发展为特征的社会变迁阶段;从文化上说,第一阶段为传统文化阶段,第二阶段为传统文化的变革阶段,第三阶段为现代文化阶段。

表 圆 峭歧的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灵怨缘)

指 标	数 值
面积(平方公里)	源
人口(人)	源缘
劳动力(人)	圆苑
耕地(亩)	猿
现价社会总产值(万元)	缘
农业(万元)	怨
农村工业(万元)	缘
建筑业(万元)	猿
运输业(万元)	远
商饮业(万元)	圆
国内生产总值(万元)	源
怨不变价农业总产值(万元)	源
种植业(万元)	圆
林业(万元)	圆
牧业(万元)	远
副业(万元)	远
渔业(万元)	圆
怨不变价工业总产值(万元)	缘
人均分配水平(元)	猿

资料来源:江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阴年鉴(灵怨缘)》,江苏年鉴杂志社 怨年版,第 猿页。

当然,这只是一种粗略的概括。更具体地,不妨以人口转变过程来观察这一过程的社会经济变化及其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在第一阶段,峭歧 1949—1959 年间的人口出生率为 28.1‰,人口死亡率为 18.1‰,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为 10.0‰;到 1960 年,出生率降到 18.1‰左右、死亡率降到 10.0‰以下,而自然增长率则在 8.1‰以上;而到 1969 年,三者分别为 18.1‰、10.0‰和 8.1‰。也就是说,在第一阶段,峭歧处于人口转变的早期转变阶段,亦即,以死亡率率先下降为标志,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开始明显下降,人口增长不断加快。在第二阶段,峭歧处于人口转变的后期转变阶段,亦即,出生率和死亡率继续下降,直到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其间,死亡率持续下降,而出生率则是在 18.1‰左右的水平上波动一段时间后才开始下降,因而,人口增长在 1960—1969 年代为快速增长,1970 年代以后持续快速减慢。在第三阶段,峭歧处于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已降到很低的水平,人口增长也几乎进入零增长状态。这三个阶段的人口转变特征与峭歧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相联系的。在第一阶段,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使出生率和死亡率也开始缓慢下降。在第二阶段,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出生率和死亡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人口转变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特征则是政策的作用所致,前一时期里没有采取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因而,死亡率持续下降的同时出生率维持较高的水平,人口增长也较快,而后一时期里则由于开展计划生育活动使出生率迅速下降,人口增长迅速减慢。在第三阶段,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使出生率和死亡率均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特别是,在生育问题上开始由政府控制的行

为逐渐转变为自觉控制的行为。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峭歧的人口转变已由传统阶段转变到现代阶段。

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峭歧的社会经济各个方面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既是在愈益庞大的人口压力下进行的,同时又反过来影响人口的变化。事实上,正如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的,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之所以如此迅速,一方面在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人口转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在于政府的政策推动作用,正是有效的人口控制政策的作用,使中国人口出生率比西方国家下降更快、下降幅度也更大。在 20 年代以来的短短 10 年间,中国就完成了西方国家用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被视为一种奇迹。不仅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状况也得到明显的改善(朱国宏,1992)。

三、为什么对中国的前景感到悲观： 汤普逊的依据

由上可以看到,在近 10 年里,峭歧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这是过去的许多学者所不能想到的,也是过去的许多研究者所没有预见到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在悲观论者之所以悲观的一个基本前提之下得到发展的,那就是,中国人口不仅在那些预言之后继续增长,而且增长率远远高于当时所能预见的程度。譬如,汤普逊

在分析中国发展前景时感到悲观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当时的“人口自然增长相当快”,而那时(1949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其实连 1% 都不到(参见表 10)。事实上,在后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峭歧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远远超过 1%,甚至高达 2% 以上。在建国后的 1950 年代后期,研究中国历史上农业发展问题的珀金斯也正是看到了中国这种高达 2% 以上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才对中国的前景不抱任何希望。

表 10 峭歧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1949—1959)
单位: %

年 份	出 生 率	死 亡 率	自然增长率
1949—1950	1.1%	1.0%	0.1%
1950—1951	1.2%	1.0%	0.2%
1951—1952	1.3%	1.0%	0.3%
1952—1953	1.4%	1.0%	0.4%
1953—1954	1.5%	1.0%	0.5%

资料来源 乔启明等著《近代中国人口统计的一项实验》,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5年,第 156 页。

这样,要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在庞大的人口压力之下得到发展,首先必须弄清楚庞大的人口压力为什么会使研究者得出悲观的结论。被研究者忽视的地方或没有预见的地方,往往也就是原因之所在。

汤普逊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指代发展,并从农业和工业两个方面来讨论中国发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如果中国人要生活得更好,那就必须有更高的工农业生产能力”^①。

① 乔启明等,1985 第 156 页。

汤普逊首先讨论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可能贡献。他不同意许多人关于中国的农业已经达到顶点的观点。他引用布克(1950年,另译卜凯^①)关于中国农作物生产的调查数据说明,中国的农作物生产上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如日本单位土地的水稻产量比中国多得多。因此,中国农业在种植重要作物方面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获得极大的利益。然后,汤普逊从提高农作物产量的三条途径——即培育和选择优良作物品种、提高耕地质量和使用化肥以及改进农田的经营管理——讨论中国农作物产量提高的可能性。接着,他又讨论了中国土地利用现状,指出,当时中国的土地利用不充分,而且没有更好地利用荒地和发展灌溉。如果把这些因素都加以充分考虑,他认为,中国的农业发展还有相当大的余地。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根据目前正在使用的土地和有待耕作的土地的质量上的差别,进行合理的折算,人们设想中国的农产品可增加一倍。我认为这个估计是比较宽的。假如再加上通过上述改进农业的措施所增加的产品,那么中国扩大农业生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个可以为多于现有人口一倍的人提供维持目前低下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农产品;中国也可以为和现有人口相同的今后两三代人增加大量产品,使他们过着富裕的生活。”^②

然而,问题在于,中国有着相当快的人口增长,因而在考虑未来 15 年的前景时,汤普逊又指出:“在我看来,

① 卜凯曾在 1940 年代前后主持了一项大型的调查项目,共调查了 18 个省的 100 多个农户,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参见卜凯,1950。

② 乔启明等,1950 年第 1 页。

只要现在的这种鼓励生育的社会观念维持不变,一切中国农业的可能改进和新土地利用都没有多大作用。”^①

那么,工业化是否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呢?汤普逊从自然资源、资本、人力资本、市场和经济组织的类型五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但是,结论同样是悲观的。因为,中国并不具有像世界上其他某些国家那样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而且,在今后一两代的时间里,资本短缺可能是阻碍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人力资本方面,则很可能在至少两三代的时间里,中国的工业将因缺乏受过训练的管理人员和实际操纵机器的工人而受到严重阻碍。再从市场条件来看,中国商品在国外市场的可能增长将和国内市场的增长同样缓慢,即使中国工业产品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扩展达到其最大限度,工厂也不可能迅速吸收大量人口。从中国的工业发展计划来看,由于没有一个实际的全面的经济发展计划,或者即使有了这样的计划而没有实行这项计划的意志和力量,中国的经济发展肯定也将是缓慢和游移不定的,结果这种发展很可能带来浪费和混乱。正因为如此,汤普逊指出:“凡是读了到此为止的全部论述的读者将不难预见,在今后三四代人的期间,在工业发展可能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带来多大的改善这个问题上,将会得出什么结论。描写工业工人的生活条件可能稍稍得到改善,同时,生活在能够维持良好健康的生活条件下的人口的绝对数目也无疑将大量增加,但是对于广大农民,甚至对广大的工人来说,

① 乔启明等,《~~美国~~第~~10~~页。

看来改善的希望是很小的，除非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根本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我们考虑的这段期间内看来是不大可能发生的。”^①

综合考虑了中国的这种工农业发展状况，汤普逊“不得不”对可见的将来中国生活水平改善的可能性感到悲观。他说：“关于对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展望，我觉得自己是个马尔萨斯的忠实信徒。”^②

汤普逊虽然对中国的未来感到悲观，但他并没有断言中国没有一丝发展希望，只是他不敢相信而已。他说：“当然，什么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后三四代的情况也不会总是这样。那时候，中国将认识到像西方那样的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优点，而且会向往只有低出生率才能带来的舒适富裕的生活。但是由于我还不能预见到中国许多青年人认为今后几十年内将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我便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对 20 世纪广大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前景抱多大的乐观态度。”^③

四、中国如何发展 路径和方式

中国之所以得到发展，而且是迅速的发展，部分原因是由汤普逊已经意识到的因素使然，但是，他不敢对此“抱多大的乐观态度”，更不敢相信竟然会发展那么快，而另外部分原因则是由汤普逊所没有或不能预见到的因素使然。

① 乔启明等，见前书第 522 页。

② 乔启明等，见前书第 524 页。

③ 同上。